

● 中印社会比较研究

# 中印比较视野下的现代性、民族主义、精神与世俗

——Peter van der Veer 思想述评

黄玉琴<sup>1 2</sup>

(1.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学系, 上海 200237; 2. 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 上海 200237)

[摘要] 本文述评了 Peter van der Veer 比较印度和中国的现代性经验的研究, 即关于自殖民时期到后殖民时期, 两国民族主义、现代性努力、宗教和世俗势力之间的纠缠和演化的研究。本文认为 van der Veer 的中印比较研究对曾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理论范式”进行了反思, 他主要挑战了将欧美的现代性作为理想型、而非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只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模仿的观念, 以及世俗化的观念。本文介绍了他相关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 尤其“帝国的现代性”情境下中印民族主义与宗教的关系、世俗化作为国家工程在两国的发展和两国表征在身体上的民族精神即瑜伽和气功。本文最后指出了 van der Veer 中印比较研究中的一些不足, 但仍然认为他的思想是开拓性的, 他对世俗化理论和其背后的现代化理论的挑战和反思代表着这个领域最先进的理念。

[关键词] Peter van der Veer 现代性 民族主义 精神 世俗 中印比较

[作者简介] 黄玉琴(1978-),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性别、家庭、宗教等方面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 C91-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72(2016)03-0001-10

Peter van der Veer 是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族群多样性研究所所长, 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亚洲和欧洲的宗教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他是著名的印度研究专家, 早期的作品以殖民主义背景下印度的宗教民族主义、被殖民势力和殖民势力的碰撞为主, 生产出一批重要作品, 比如 *Gods on Earth* (LSE Monographs, 1988), *Religious Nation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Imperial*

*Encounte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Conversion to Modernities* (Routledge, 1997), *Nation and Relig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等。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 他的研究兴趣逐渐转向中国, 尤其关注中国和印度的比较研究。他的中印比较着重在两个领域, 一个是大都市和城市化, 这个领域不仅关注中国和印度, 也检讨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其中一个成果是合编著作 *Patterns of Middle-Class Consumption in*

India and China (Sage, 2007);另一个研究方向是比较印度和中国的现代性经验,尤其是自殖民时期到后殖民时期,两国民族主义、现代性努力、宗教和世俗势力之间的纠缠和演化。他的初衷是考察比较印度和中国民族国家诞生时期的现代性经验,因这一时期两国都是处在一个“殖民主义”的背景中,因此他称这一现代性经验为“帝国的现代性”(imperial modernity),即与帝国碰撞之后形成的现代性。他认为,在这种碰撞中,有关国家的话语形成了,而这个过程中文化和宗教话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研究的重点变成考察印度和中国民族国家兴起时民族主义、宗教及有关话语、帝国的现代性追求等力量之间的互动。这个领域产生出一批重要的成果,包括一系列论文和专著 *The Modern Spirit of Asia: The Spiritual and the Secular in China and Indi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在2013年他受邀在美国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著名的人类学讲座系列 Lewis Henry Morgan Lecture 上作了题为“The Value of Comparison”的讲座,利用印度和中国比较研究的例子从方法论上肯定了比较研究的价值。

本文重点对 Peter van der Veer 在中国和印度民族主义、现代性、宗教和世俗之纠缠和演化经验的比较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进行评论。文章先勾勒出 van der Veer 在这方面思想的出发点,其继承的研究传统和研究框架,尤其是他的由“精神、世俗、宗教与魔力”等概念组成的“组合链”框架,以及比较的研究方法。然后分别介绍其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比如“帝国的现代性”情境下中印民族主义与宗教的关系、世俗化作为国家工程在两国的发展和两国表征在身体上的民族精神即瑜伽和气功。文章最后对 van der Veer 的思想进行了评价,陈列了其贡献和研究中的不足之处。

## 一、研究传统、比较的方法和研究框架

Peter van der Veer 关于中印现代性和宗教经验的比较研究沿袭了比较宗教社会学的传统,但从很大程度上是对该传统早期观念的修正和反思。早期启蒙时代随着欧洲在全球的扩张,出现一种观念认为宗教是自然的、普遍的,但有不同

的形式。但在十九世纪,这种普遍主义的观念和进化论结合,认为基督教是最发达的、文明的并且从科学和道德角度讲都比世界其他宗教形式先进的宗教。所谓“世界宗教”的观念诞生了。马克斯·韦伯从社会学角度对这种观念做了一个推进,他认为某些宗教或者其某些方面能促进社会的发展而其他宗教或其他方面则是阻碍发展的。整个宗教社会学则是继承了这个观念,认为之所以欧洲的现代化过程能成功,而世界其他地方失败了,是因为欧洲宗教体系中有使其成功的必然因素而别的宗教系统则没有。因此有了韦伯的比较宗教学研究。但 Van der Veer 认为这种传统的比较宗教社会学一个最大的缺点是它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这种观念认为欧美的现代性是一个典范,而非西方的现代性则是对这种西方现代性的模仿。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在现代化范式内部出现大量关于现代性本质的争论。一些人强调只有一个起源于西方的单一的现代性,这个现代性被输出到东方;另一些人则认为存在与帝国主义无关的、东方发展出的、本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在最近十年,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存在多种现代性,认为西方现代性的本质是多样性的,它的影响也是多样的;西方现代性对非西方社会的影响也是多样的。

Van der Veer 认为印度和中国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改变了古老的传

---

这些论文主要包括:“Global Breathing: Religious Utopias in India and China”,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2007, 7, 3: 315-328; “The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India and China”, *Social Anthropology*, 2009, 17(1), 90-108; “Body and Mind in Qi Gong and Yog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India and China”, in *Eranos Yearbook*, 2010, 69, 128-141; “Smash Temples”, *Burn Books: Comparing secularist projects in India and China*, in: Craig Calhoun, Mark Juergensmeyer and Jonathan VanAntwerpen (eds.), *Rethinking Secularism*.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70-281; “Religion, Secularism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India and China.”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12, 33(4): 721-734.

Van der Veer. Peter, “Religion, Secularism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India and China.”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12, 33(4): 721-734.

统,不是对西方现代性模仿的结果。那为什么要进行中印比较研究?有人可能会认为,在现今全球化的趋势下,比较社会学没有必要了,因为全球的力量在同时形塑着各个社会,我们应该研究的是这些起形塑作用的力量。但 Van der Veer 提出,这些力量以不同的方式形塑着各个社会,我们应该比较的是这些不同的方式。有时候同一种全球化力量即使在同一种社会中发挥影响的方式可能都不同。全球化时代下民族国家并没有衰落,但由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而经历着显著的转型。对中国和印度现代性经验的比较,是对传统比较社会学的一个挑战和修正。欧美在中国和印度现代性的形成中起了关键的影响,但欧美相似的挑战和影响如何形塑了印度和中国不同的社会状况?对这种不同形塑方式的比较将是很有意义的。

就印度和中国以及其他非西方社会的现代性来讲, van der Veer 提出不能像有些人建议的那样,认为中国和印度只能以两国自身的方式而不是西方的方式来理解。van der Veer 认为所谓的中国和印度的方式需要以和西方学术圈相关的方式来解释和转译,而这种转译和解释是两国和西方互动史的一部分。他这里提出了一个关于现代性研究的新视角,即研究“帝国的现代性”对中国和印度有关民族国家话语的发展的影响。他认为为了理解印度和中国的现代性,必须解释殖民主义在这两个民族国家诞生之际所扮演的复杂的、不同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较不是只是简单地将两个或更多不同的社会并排放置在那里比较那么简单,比较社会学的“比较”应该是建立在对我们研究社会所采用的概念的网络和这些社会本身形成的过程进行复杂的反思基础上的。

目前,虽然很多的文献研究印度和西方的互动以及中国和西方的互动,但很少有人对这两种互动进行比较。印度学者看西方,中国学者也看西方,但两者之间两两相望的情形很少。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西方现代性对亚洲的强大影响,也包括西方学术体制和学术圈在世界的主导作用。在亚洲,长期以来西方社会被认为是

发展的模范,现代化理论成为社会科学发展的主导地位。但 van der Veer 认为这种状况应该改变了,部分原因在于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和印度经济上的崛起,另一部分原因在于过去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化理论已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可信性。他的中国和印度的比较研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

Van der Veer 的中印比较研究同时也是对传统“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世俗化理论的一个挑战。“世俗化”理论是宏大叙事“现代化范式”(modernization paradigm)的一部分,它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教会消失,世俗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但自 1990 年代以来,各种形式的宗教在世界各地的复兴和发展使得整个“世俗化”理论受到了质疑。在对现代性和民族国家兴起的研究中,有关国家话语的形成是一个重要因素。通常的分析从政治和经济话语的形成入手,且采用一种世俗主义的立场,低估了宗教在现代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但 van der Veer 则强调了这个过程中文化和宗教话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宗教和民族主义之间是紧密相联的。在他的中印比较中,他追踪了西方关于“宗教”和“魔力”等现代概念如何嵌入进印度和中国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所发起的国家建构工程,并阐明两国的现代性经验是完全不同的。他抛弃了将“宗教”和“世俗”对立的二元对立框架,认为世俗化不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而是知识分子和国家所发起的一个有力的工程(project),这个工程本身也是带有宗教性的。

他进一步发展了一个“宗教-魔力-世俗-精神组合链”(“syntagmatic chain of religion-magic-secularity-spirituality”)的框架来推进他的中印比较研究。他认为在中国和印度对现代性的追寻中,四个概念,即精神/灵性(spirituality)、世俗主义(secularism)、宗教(religion)和魔力(magic)形成

Van der Veer, Peter, *The Modern Spirit of Asia: The Spiritual and the Secular in China and India*,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了一个“组合链”。这几个范畴无法在彼此独立的情况下拥有稳定的含义,因此不能简单地分开来定义。它们在历史上是同时出现的,彼此阐明,在一个变动的权力场域中发挥节点的功能。它们互相联系,属于彼此,要依靠彼此来互相定义,但又无法互相替代。这个组合链是现代性的民族主义想象的一个关键。下面关于“宗教与民族主义”、“作为国家工程的世俗主义”和“精神民族主义”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组合链”上各范畴的关系。

## 二、宗教与民族主义

传统的观念认为从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带来了民族主义,与之相随的是个人主义和世俗化。这也是现代化理论的一部分,带有目的论的色彩,认为和欧洲国家一样,民族主义也会在其他地方到来,并产生现代性的果实。但 Van der Veer 对这种观念进行了批判。民族主义是否是一个世俗的现象?他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宗教和民族主义之间有很深的联结和关系。他从比较的视角研究了中国和印度民族主义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和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共同点是都认同关于进步、理性、平等的观念,都反对帝国主义,但宗教在两国民族主义想象中的位置是非常不同的。简单点说,“宗教”是印度民族主义很宝贵和关键的一方面。印度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是将某种宗教作为国家认同的基础,同时将非该宗教信徒的人置于二等的、次一级的地位。而宗教在中国的民族主义中则被看作是发展的一个障碍。Van der Veer 认为这种不同可以透过比较印度和中国分别被“帝国的现代性”所改变的方式来理解。帝国之间的互动是形成“帝国的现代性”的关键因素。Van der Veer 提出,西方帝国主义或者欧美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国帝国主义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都占据着世界主导地位。而宗教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形成印度和中国现代性的构成性元素。目前阶段的全球化使得我们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但世界历史通常更多地强调经济和政治,并且通常是采用一种世俗主义的方式,反而低估了宗教在现代性形成过程

中的作用。因此, Van der Veer 在他的思想中采用了一种“互动史”的观念,强调西方和印度/中国的关系,重点考察“宗教-魔力-世俗-精神的组合链”。这个组合链在现代性的民族主义想象中占据了一个关键地位。如果只强调经济发展,现代化的历史在世界史中就会占据中心位置,并且这种历史书写方式是一种目的论的做法,强调世俗化过程消除了宗教。而 Van der Veer 推崇的则是一种非世俗主义的反论。他认为可以同时是“现代的”和“宗教的”,二者并不是排斥的。同时他提出,世俗化和世俗主义本身不是想当然的过程,而是一系列工程,是需要和其他政治工程一起研究的。他一再强调宗教-魔力-世俗-精神是现代性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要理解为什么宗教在中国和印度民族主义想象中的位置不同,以及两国分别被“帝国的现代性”所改变的不同方式如何造成了这种位置不同,就需要联系“组合链”中的其他要素,尤其是“世俗(化)”这个要素及其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来理解。

## 三、作为国家工程(national project)的世俗主义(secularism)

如前所述,“世俗化”理论在现代社会受到了挑战。不过, Van der Veer 认为,在对“世俗化”理论的批评中,有一个观念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那就是:世俗主义不是国家发展的必然阶段,它是这些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和国家推行的有力工程。这个国家工程认为世俗主义是对宗教的意识形态上的批判,是现代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这成为指导一系列社会运动的观念。而知识分子在推动这种观念的过程中借助作为权力之源的国家机器和社会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政治运动挟裹了世俗主义观念,将其变成有力的意识形态观念,成为实现社会力量动员的工具。但重要的是,在诸多的世俗主义工程中,会发现乌托邦和宗教的元素。总之,在“宗教”和“世俗”之间存在着互

Van der Veer, Peter, "The Modern Spirit of Asia: The Spiritual and the Secular in China and India."

动,二者不是完全互斥的关系。简单而言,在这方面, Van der Veer 用了印度和中国的例子来论证两个观点:第一,世俗主义是一个国家工程而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第二,“世俗”与“宗教”紧密相联。

对于被殖民国家的知识分子来讲,宗教是阻碍该国经济政治发展的因素。虽然都接受这个论断,但中国和印度的民族主义分子所采取的行动是不同的。在中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以及一种实践的世俗主义首先是反教权主义(anti-clericalism)。在中国历史上,反教权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在19世纪末,梁启超(1873—1929年)、章炳麟(1869—1936年)和陈寅恪(1890—1969年)这类知识分子将佛教和道教从教权主义的根基中分离开来,并将其发展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国家道德。佛教宣扬大师太虚(1890—1947年)和道教现代派代表陈撄宁(1890—1969年)不遗余力的将他们代表的宗教置于世俗民族主义的名义下。大众媒体也并不反对宗教传播,但反对佛教和道教的神职人员,认为他们无知、贪婪和好色。神职人员也被视为是危险的暴力分子。比如十九世纪,他们能够组织秘密社会团体来威胁国家的暴力专制统治。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使中国知识分子明白了用神力的手段打败帝国主义列强是没有前途的。

此外,中国的世俗主义也是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一种形式。“迷信”和“宗教”等在现代性话语中被使用的术语事实上来自于日本。中国的世俗主义者在“宗教”和“迷信”之间作了区分,认为前者能成为国家道德体系的一部分而后者会阻碍现代进步。这个观念被接受的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一些宗教改革思想家都认同。一个后果就是传统的“三教”(儒教、佛教和道教)变成“五教”(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儒教”被剔除出体系之外,是因为它是全国性但不是全球性的,而且本质上它是世俗而非宗教的。同样被排除在外的是各种形式的“民间宗教”,它们被认为是地区性的迷信。中国的世俗主义工程中的反教权主义和科学主义和西方关于进步的启蒙观念紧密相联。在这种观念中,“魔力”被科

学理性所取代,与魔力有关的宗教形式也要被成为国家认同基础的道德宗教所代替。知识分子在这种将宗教民族主义化和理性化的世俗主义工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也是国家干预而产生现代的国家认同中一个部分。比如有些儒教知识分子曾试图将儒教转变成一个全国性的公民宗教,但失败了,主要原因在于儒教很难囊括底层力量。

但总体来说,即使有“毁庙办学”以及其他一系列世俗化的措施,自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由知识分子和国家主导的系统的世俗主义工程并没有很成功。Van der Veer 认为即使是在现代中国,宗教活动似乎嵌入进完全世俗的生活。为什么呢? Van der Veer 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历次政权在动员(底层)社会力量的时候吸纳进一些与(尤其民间)宗教力量勾连很深的阶层。总体上讲,即使是宗教的神职人员也仍然在“世俗的”框架下从事宗教活动。也更加证明了现代中国社会中宗教和世俗力量并不是截然二分的。

在印度,虽然其世俗主义与中国有类似的地方,但印度的种姓制度和跨族群、跨社区之间的关系明显改变了其中的某些元素的含义。在印度教中,婆罗门是最重要的神职阶层。在十九和二十世纪,婆罗门种姓整体上受到世俗主义运动的攻击,尤其在印度南部和西部。反教权和世俗主义运动相联结,成为反对婆罗门种姓阶层的工具。这场反教权运动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基督教的宣教士,他们中伤印度教神职人员由来已久;二是基督教宣教士积极在部落人民和低种姓阶层中宣教,想让他们脱离印度教。基督教宣教士的说辞被反婆罗门势力接受。由于种姓和宗教的联系,印度的反教权主义截然不同于中国。在印度,象征种姓制度的婆罗门神职人员容易受到攻击。

---

Van der Veer, Peter, "Smash Temples, Burn Books: Comparing Secularist Projects in India and China."

Van der Veer, Peter, "Religion, Secularism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India and China."

印度世俗主义也有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元素。但自十九世纪开始,印度知识分子不再强调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对立,转而强调本土传统中的科学本质。虽然中国知识分子也在某些宗教传统中找到理性和科学成分,尤其是医学领域中,但总体上中国知识分子比印度知识分子有更强的意识,认为只有将科学和魔力分开、摧毁魔力,才能实现进步。在印度,世俗主义的兴起面对着这样一个背景:世俗的殖民政权试图在宗教分化中保持中立。这意味着国家不得不在“中立”的掩护下来推行其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工程。但殖民政府的这种中立立场被印度民族主义者理解为“分而治之”的一种形式,尤其在需要处理印度教与穆斯林关系的地区。因此国家被指责为“伪世俗”;这个指责也被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用来批评后来的后殖民政府。既然殖民政权对宗教保持中立立场,这使得反殖民的民族主义者和宗教之间多了联系。印度的反殖民民族主义不论是从观念上还是组织上都从宗教势力中汲取诸多力量。在后殖民时代,宗教多元化的愿景是那些想将印度建立一个世俗国家的观念基础。这和伊斯兰分裂分子和印度教民族主义分子的愿景是不同的。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对立成为建立一个统一印度国家的主要威胁。这个对立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世俗主义似乎是解决的方案。同时,印度社会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体系之一,而不平等是印度教传统所允许的。因此,世俗主义再一次被看作了解药。独立以后,对国家世俗主义干预持反对态度的学者认为印度本质上就是一个宗教的社会。事实上,今天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党派如人民党所反对的正是这个政策。他们并不认为当今主导印度社会的是反宗教的世俗主义,而是一种“伪世俗主义”,政客们为了从小众的宗教族群获得选票而给与他们特别的好处。

中国和印度的例子显示,在这两个社会中,世俗主义不仅仅是反宗教的,尽管其中也有反宗教的因素,它同时试图将宗教转变成公民权以及国家归属的道德资源。大众需要再教育来意识到他们的解放潜力,而宗教可以充当实现这种再教育

的国家机器。在世俗主义的体制中,宗教是国家化的、现代的。但宗教永远不会被世俗主义的框架所完全控制。正因为世俗主义是一个工程而非一个必然过程,它当然是未完成的,必然产生它自身都无法解释的矛盾。

#### 四、精神(spirituality),精神民族主义(spiritual nationalism),瑜伽和气功

西方关于“精神/灵性”(spirituality)的概念成为印度和中国各自的文化自我形成时的一个核心概念。虽然源于西方,但“精神”的概念在中国和印度的含义非常不同:甘地和泰戈尔都认为印度本质上是精神/灵性的,是对西方物质主义的一种抗拒;而在中国的宗教改革则竭力避免诉诸灵性,不遗余力地宣扬科学。但总体上,两国与“精神/灵性”有关的运动都是在与西方帝国的碰撞中形成的,都产生出一种精神民族主义(spiritual nationalism),虽然两国精神民族主义的形成路径不同,诉求也不同。Van der Veer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是通过比较印度瑜伽和中国气功在两国的历史展开的。

目前的全球化境况下,学界对席卷全球的各类灵恩派基督教和虔诚派伊斯兰教关注较多,但忽视了亚洲精神形式的全球化。印度瑜伽和中国气功是两国“国家精神”(national spirituality)的代表,虽然已传播至全球,但仍然与国家的认同有关。Van der Veer认为,以瑜伽和气功为载体的精神运动是两国和西方帝国碰撞的结果。他认为这里的“全球性”和“国家性”是不矛盾的,因为印度瑜伽和中国气功是两个民族国家建构的“文明成果”,同时也彰显着一种全球性的现代性。两者与现代性的建构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印度瑜伽和中国气功被认为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形式,但事实上,它们都深刻嵌入在政治经济史当中。历史

Van der Veer, Peter, "Religion, Secularism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India and China."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12, 33(4): 721-734.

Van der Veer, Peter. "Spirituality in Modern Society."



上,瑜伽是一种古老的呼吸和身体运动,在十九世纪时被改造成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一部分,同时也被认为是东方精神的一种形式,是对西方社会殖民物质主义的一种替代。而中国气功在历史上也是诸种呼吸运动的一种形式。和瑜伽一样,它在近代历史中被塑造成国家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这个观点本身是对“世俗化”理论的一个反驳,Van der Veer认为现代社会中诸多我们认为世俗的事务,却是精神的、具有宗教意涵的,并且带有政治意义的,这反驳了那种认为宗教和世俗之间界限分明的观点。在Van der Veer看来,现代性的努力也不是世俗的,而是与精神和宗教纠缠在一起的。当然,这种将现代性看作是世俗的观点在社会学里可以找到很深的源头,比如马克斯·韦伯在分析新教现代性时强调了从“传统”到“现代性”的转变。韦伯在“入世禁欲主义”和“出世禁欲主义”之间作了区分,后者属于其他古文明的宗教体系,比如印度教和佛教,而前者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兴起的核心。在反驳经典“世俗论”的基础上,Van der Veer进一步摒弃了这种区分,反之使用了一种“互动的视角”,关注印度和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帝国的现代性”之间的互动。而这种互动是亚洲和欧洲的全球现代性以及民族现代性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同时造成了各国彼此之间现代性想象的异和同。这种现代性想象的基础是“东方精神”(eastern spirituality)和“西方物质主义”(western materialism)之间的对立。但对立的两边各有例外,一边是西方现代性在物质方面的成功和精神上的浅薄,另一边是东方现代性在物质方面的贫瘠和精神上的丰富。像反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泛亚洲主义、灵性主义等运动和东方主义哲学、比较宗教学等学术发展都利用了这些基本对立中的元素。这是理解中国和印度精神运动的大背景。最根本的一点,像“宗教”、“精神”这些范畴是深深嵌入在现代性的谱系里面的,正是世俗、现代主义文化中的“精神”因素保证了传统的纯正性。

印度瑜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呼吸技巧和其他的躯体运动发展成宗教规训的一部分,并包含偶像崇拜或禁欲主义的成分。到十九世纪,随

着殖民者到来的基督教宣教士对印度教发出挑战,认为只有基督教是真的宗教,印度教是落后的宗教。印度国内兴起一系列运动,宣称印度教不仅仅在精神上比基督教更真,而且也是“现代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实践比如瑜伽成为城市宗教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十九世纪下半期,印度宗教运动再次采用了西方关于“东方精神”的话语,将印度教的话语传统转译成“精神”,这意味着对这些传统进行重大变革。其中一个重要改革人物Vivekananda将其导师Ramakrishna(一个密宗瑜伽大师)的宗教观念和实践进行现代化、净化处理,使其被加尔各答摩登化的中产阶级所接受。Vivekananda在一次对美国芝加哥的访问中将其观念传播到了西方,开启了“印度精神”的西方之旅并在和世界其他地方不断的互动中而发展。他在其英文著作中不断将西方的“精神匮乏”和印度的“精神丰富”相对比。他的一个主要贡献是将瑜伽创造成一种超意识的印度科学。瑜伽在现代社会则成为印度国家统一的标志,不仅仅供国人消费,也供整个世界消费。Vivekananda认为,宗教是建立在理性而不是信仰的基础上,基于此,他将瑜伽塑造成一种科学的传统。这种对“精神”的建构对于印度教民族主义至关重要。

在中国,气功在二十世纪的出现和印度瑜伽的变革形成有趣的类比。和瑜伽一样,气功所蕴含的呼吸练习和身体实践历史悠久,并且和各种对“精神”和宇宙秩序的理解相关联。在长久的历史中,各类不同的具有军事特征的团体修习这种精神和身体实践。但似乎列代帝国皆将这些团体视为对国家控制的一种威胁。这些团体在帝国主义的情境下要么转变成受基督教影响、抱持弥赛亚观念的运动比如太平天国运动,要么变成反基督教和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如义和团运动。但长久以来中国当权者对民间的传统都抱持一种不信

Van der Veer, Peter, "Global Breathing: Religious Utopias in India and China"; Van der Veer, Peter, "Body and Mind in Qi Gong and Yog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India and China".

任的态度,结果,中国民族主义者都持一种反宗教的、科学的立场。当启蒙时期的范畴“宗教”传入中国时,“民间宗教”被认为是“封建迷信”,而教权主义的传统如佛教和道教则被认为应该置于国家政治权威的控制之下。在中国和印度,基督教都被认为是“外国的”、“帝国主义”的。但中国民族主义者和印度民族主义者的一个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没有将宗教认同和差异作为自己的主要标记,反而是对民间宗教的攻击、认为其属于封建迷信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标志。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吸收了科学世界观的知识分子领导了反对民间宗教的运动;而在印度,是神职人员和知识分子领导了这类运动,但他们的初衷是通过移除印度宗教中的迷信成分和增加对经文的解读来改革本土宗教。在中国和印度,民族主义都需直面一个具有很强攻势的基督教宣教工程,但不同的是,在印度,这个宣教工程是直接受中央殖民政权支持的;而在中国,帝国主义从未真正控制政权。在印度,民族主义者认为在被殖民国家,他们不得不通过改革来捍卫自己的宗教制度。这么做的一个结果就是瑜伽的国家化,使得瑜伽成为“真正的印度”的一个国家象征。在中国,知识分子由于统治者长久的对民间传统的不信任而选择变成真正的世俗的民族主义者。这在五四运动和民国时期对宗教制度和实践的攻击中产生。

在现代中国,不论是民国时期还是1949年以后,“科学”都是建构民族和现代性所需的一个符号。印度民族主义者通常认为保护本土宗教、反对帝国主义是他们的职责;而在中国,民族主义者认为宗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障碍,宗教是迷信,而不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本质。因此,在之后气功竭力向科学看齐,逐渐成为国家准许的医学科学的一部分。在印度,现代性也是在科学的标签下被理解的。世俗主义者对传统宗教的攻击很少,而在一些民族主义运动中,改革者们试图将宗教从所谓的“迷信”中净化出来,并表明这些宗教是有着科学基础的。所谓的“理性宗教”(rational religion)即是这些改革运动中的一个潮流。

现代化是一个科学工程,不仅世俗主义者这样认为,殖民政府也这样认为。世俗的民族主义者比如尼赫鲁也相信印度要再度工业化,就需要科学的精神。但他们不认为“技术-科学”本身可以满足生命的基本需求。尼赫鲁认为印度的文明拥有巨大的道德资源,可以帮助印度为了实现共同利益而使用现代科学技术。而甘地则对此持相反意见。他认为印度只有拒绝了“技术-科学”的暴力并且将“工业”置于手工艺的传统中,才能实现真正的(也即精神上的)独立。在他的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入世的禁欲主义”——对西方(殖民者的)文明中物质主义从精神上的一种拒绝。甘地将瑜伽称为“真理的实验”,从而将其现代化、国家化。

印度瑜伽和中国气功作为印度和中国传统与现代性的象征,是在与帝国的碰撞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形成的。这个复杂故事的一个面相是,启蒙的世俗理性并没有成为支配性的力量。虽然对宗教传统的攻击在两个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同样两国都对自己传统的民族文明带有某种自豪感,将其作为对抗帝国殖民的工具。西方的现代性观念认为(东方)传统是某种形式的迷信,是落后的象征,现代性必须是科学的;但印度瑜伽和中国气功的故事提出了一种相反的观点,即这些传统在其本质上事实上是“科学的”。这种宣称在印度和中国都会带来某种政治影响。在印度,这些运动演变成合法的民族主义工程;而在中国,这些运动受到从国民党到共产党的持续打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这需要到中印两国前殖民时代和殖民时代的政治史中去找原因。在前殖民时代的中国,清廷不断发现农民的反叛是受宗教宇宙学启发的,而受儒教影响的知识分子对大众宗教持怀疑态度。十九世纪的反基督教和帝国主义的宗教反叛使得中国掌权者和知识分子相信“世俗的科学”是将中国从落后的境况中解救出来的药方。但在印度,宗教运动逐渐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精神抵抗力量的一部分,因此成为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一个主要内容。在后殖民时代,正是受全球资本主义影响的印度和中国的经济自由化释放了精



神运动的能量。这在中国表现为一段时间内气功运动的流行;而在印度,这尤其表现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兴起,他们强调印度教传统是印度文明的基础,因此拒斥早先国家所推行的世俗的、多文化的工程。

### 五、对 Van der Veer 思想的评价

Peter van der Veer 近年来从宗教和精神/灵性角度关于中国和印度现代性经验的比较研究,不论是从方法上还是思想上,都颇有影响。沿袭其早期关于宗教和民族主义之纠缠的研究,他的中印对比为宗教演进的研究和对西方现代性之外的所谓“另类的现代性”经验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他对中国和印度的比较一个很明显的优点是能从同中找到异,从异中找到同。另外,他的研究一个很大的贡献在于不再在二元对立的框架内来看“宗教”和“世俗”等概念。他的“宗教-魔力-世俗-精神组合链”将这一系列概念看作是互动的,这是很大的一个突破。不过他的研究也受到一些批评。

首先,有关中国研究的实证资料比较弱;可能跟 Van der Veer 以印度研究专家起家有关,他的比较研究中中国一方有时候论证不完整。比如关于十九世纪中国人皈依基督教的情况,他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仰赖于 Ryan Dunch 对福州清教徒的研究,但 Dunch 的研究并不必然代表中国其他地区或者其他教派,比如天主教的状况。而且, Van der Veer 没有考虑最近的研究成果,比如 Lian Xi 关于现代中国民间基督教兴起的研究。后者和其他成果表明中国的基督教皈依实际是一个非常复杂、并且内部有多样差异的现象。

其次,对中印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关系的比较实际上受彼此语言的影响很大。换句话说,“帝国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中国和印度社会以及人民的体验实际上是非常不一样的。但 Van der Veer 所依赖的分析材料主要是母语为英语的学者所传达的,这对于以英语作为学术语言的印度不太成为一个问题,但对于中国的案例则是一

个大问题,因为 Van der Veer 研究中国所引材料多是那些以西方的或者被西方化的观众的消费为指向而写成的,有夸大西方影响的嫌疑。另外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他忽视了他其他很重要而独特的影响力量,尤其是日本的影响。并且,同样受制于可获得的关于中国的英文文献,他所选择的关于中国的案例其实是不太具有代表性的。

最后,在 Van der Veer 论述关于中国和印度民族国家兴起时精神、世俗、宗教和魔力等概念的重要意义时,他忽略了“科学”(science)这个概念。虽然他经常提起这个概念,并意识到它在中国和印度现代性兴起过程中所代表的话语力量,但他没有明显地将其指出来,因此错失了一个重要的探讨领域。

但即便如此, Van der Veer 在这方面的比较研究也是开拓性的。他对中国和印度的比较突破了以往以西方发展经验和西方学术界为标杆的做法。这也是对以往西方中心主义的一次方法论上和知识论上的挑战。他对世俗化理论和其背后的现代化理论的挑战和反思代表着这个领域最先进的理念。

(责任编辑:徐澍)

(下转第 19 页)

Van der Veer, Peter, "Body and Mind in Qi Gong and Yog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India and China".

Lisa Rofel, *Other Modernities: Gendered Yearnings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Dunch, Ryan, *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Lian, Xi. *Redeemed by Fire: The Rise of Popular Christianity in Modern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DuBois, Thomas D. "Peter van der Veer, *The Modern Spirit of Asia: The Spiritual and the Secular in China and India*", *Asian Ethnology*, 2015, 74(1): 220-222.

Hammerstrom, Erik, Peter van der Veer: *The Modern Spirit of Asia: The Spiritual and the Secular in China and India*, *Review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2(2015): 281-284.

愿意指出的是,摊贩经济作为一种社会中底层集中受益的非正规经济,具有诸多方面的正功能,比如解决就业、穷人增收、生活便利化、降低生活成本和维持社会稳定等等,这些正功能实际上需要中国大城市的城市管理者给予更多的重视。特

别是当下中国,经济上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社会总体就业形势趋于紧张,城市地方政府似乎更需要更新理念,以一种更加包容的心态为摊贩经济留有更大的生存空间。

(责任编辑:徐澍)

## **The Governance of Street Vendors in Megacities of China and India : Administrative Elimination and Political Acceptation**

YE Min

(The Humanity School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China)

**Abstract:** After close comparison of the two countries' experiences , the article finds that China and India take two different models to govern street vending economy , the city governments of China prone to take administrative elimination policy , while the city governments of India more willing to take political acceptance policy. The differences of China and India in political system and social conditions help us to explain the dissimilarities of street governance , while the reasons of similarities root in the class collision and growth regime in the two countries.

**Key words:** China ; India ; street vendors ; governance

---

(上接第9页)

## **Modernity, Nationalism, the Spiritual and the Secular in China and India : A Review on Peter van der Veer's Works**

HUANG Yuqi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Institute of Social Work and Social Policy ,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Shanghai 200237 ,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Peter van der Veer's works on the modernity experiences of India and China , particularly on the entanglement of nationalism , strive for modernity , religion and secularity in these two nations from colonialist era to post-colonialist era. Van der Veer's research reflects upon the once dominant "modernization thesis" , mainly challenging the idea that Western modernity is the ideal and the modernity of non-Western societies is imitation of the former , and also questioning secularization thesi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main aspects of his thoughts , especi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nationalism in India and China in a context of "imperial modernity" , secularism as a national project , and spiritual nationalism embodied in Yoga and Qigong. Finally , the paper lists some weaknesses of his comparative study , but also suggests that despite these weaknesses , his works on China-India comparison are still groundbreaking , standing out from the works offering a counter-argument to secular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esis.

**Key words:** Peter van der Veer ; modernity ; nationalism ; the spiritual ; the secular ; China-India comparison